

工作稳定性对农民工汇款行为的影响 ——对共同保险理论的检验

许琪¹ 邹红²

(1 南京大学 社会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2 西南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 四川 成都 611130)

摘要: 使用 2013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结合多种理论模型对农民工的汇款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研究。农民工向老家汇款不仅是为了提高自身及其家人的经济福利,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他们在城市工作环境的影响。与西方学者提出的共同保险理论不同, 在中国, 不稳定的工作环境会显著降低农民工汇款的可能性和数额。中国特殊的家庭传统是导致农民工大规模汇款的主要原因。为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提供更多的保障有助于增加他们的汇款数额, 从而提高农村家庭的经济福利。

关键词: 农民工汇款; 利己主义理论; 利他主义理论; 共同保险理论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 - 1668(2016) 01 - 0038 - 11

Job Stability and Urban - to - rural Remittance in China: A Test of Co - insurance Theory

XU Qi¹ ZOU Hong²

(1 School of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130, China)

Abstract: The massive rural - to - urban migration and the accompanying substantial urban - to - rural remittance have drawn widespread concern of the academy in recent years. Based on the dynamic monitoring survey of Chines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2013,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eterminants of urban - to - rural remittance from thre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finds that the altruism theory and the egoism theory are supported while the co - insurance theory is rejected. The particular family tradition is the primary reason for the substantial urban - to - rural remittance and the inapplicability of the co - insurance theory in China. Improving the job stability of the inflow area and providing more access to social security programs for rural migrants c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ir probability to remit and the amount of remittance so that can substantially improve the economic welfare of rural families.

Key words: urban - to - rural remittance; Altruism Theory; Egoism Theory; Co - insurance Theory

收稿日期: 2015 - 04 - 15; 修订日期: 2015 - 11 - 02

作者简介: 许琪(1987—), 男,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助理研究员, 研究方向: 婚姻和家庭, 人口社会学; 邹红(1980—), 女,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 微观经济学, 劳动经济学。

1 研究问题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农村劳动力背井离乡,涌入城市寻求工作和发展的机会,农村向城市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人口现象之一(段成荣等,2008)。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6894万人,其中在本乡镇街道以外务工的农民工为16610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61.8%,占全国总人口的12.2%(国家统计局,2014)。

由于体制和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在中国,进城务工的农民与农村老家依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各种方式将打工收入寄回或带回老家(即农民工汇款)是他们保持这种联系的重要方式之一。在针对跨国移民和其他国家城乡移民的研究中,移民向流出地汇款的现象并不稀奇,但相比之下,中国农民工的汇款比例特别高,超过70%(李强,2001);且数额巨大,每年汇款总额超过2000亿元(李强等,2008);汇款收入占农村家庭总收入的比例也很高,超过40%(胡枫等,2008;李强,2001)。大量的农民工汇款不仅为农村家庭维持日常生活、支付小孩的教育费用和老人的医疗费用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来源,而且对缓解农村地区的资金压力、促进农业生产、降低贫困率和缩小贫富差距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梁在,诸冈秀树,2006;都阳,朴之水,2003;Rozelle & Taylor,1999)。所以,研究农民工汇款的影响因素对我们深入理解农民工的经济行为以及劳动力外流对农村家庭的生产和生活带来的影响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已有的研究中,一些学者从利他主义的理论视角出发,认为农民工汇款主要出自他们对留守家庭成员经济状况的关心(李强等,2008;Cai,2003;都阳,朴之水,2003)。也有学者从利己主义的理论视角出发,认为向留守家庭成员购买服务(如代为照看土地、房屋等财产或代为照顾亲属)或者保持其在老家的社会经济地位(如提高社会声望和维持家庭财产的继承权等)也是导致农民工汇款的重要因素(胡枫等,2008)。但迄今为止,还很少有研究关注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稳定性对汇款行为的影响。

Stark和Lucas(1988)提出的共同保险理论(co-insurance theory)认为,移民很难享有与本地居民同等的收入和社会福利,他们更可能遭遇失业的困扰,并且很有可能对迁入地的文化风俗和生活方式感到不适应,而这些潜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会强化他们与老家的经济联系,以期在未来遇到困难时能够及时得到老家的经济帮助。所以,移民的汇款行为类似于向老家购买“保险”,而且移民在迁入地的工作稳定性越差,购买保险的倾向或向老家支付汇款的经济动机也越强(Amuedo-Dorantes & Pozo,2006)。

共同保险理论主要基于西方国家的研究经验,它能否解释中国农民工的汇款行为还尚未可知;但无论该理论在中国成立与否,它都为我们深入研究中国农民工的汇款行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与西方国家的移民相同,中国农民工同样难以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福利,同样面临失业的困扰,同样可能对城市的生活方式感到不适应。而且,由于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社会和特殊的户籍管理制度,农民工面临的风险可能更多、更严重。所以,研究农民工的工作稳定性对汇款行为的影响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政策含义。基于此,本文将使用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这个问题进行系统的分析和研究。一方面,本研究试图检验共同保险理论对中国的适用性;另一方面,笔者也力求挖掘本研究背后的政策含义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2 文献回顾

2.1 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

移民向迁出地家庭汇款的现象很早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对此,西方学者提出了两种经典的理论解释。

第一种是利他主义理论。该理论肇始于贝克尔及其同事对家庭成员之间的经济交往进行的一系列开创性的研究(Becker,1974;Becker & Tomes,1979)。贝克尔认为,与市场交易不同,家庭成员之间的交往在很大程度上受利他主义情感的支配,因为父母和子女不仅关心自身的幸福,同时也关注对方的幸福,所以他们愿意在对方的生活陷入困境时提供必要的帮助。从这个理论视角出发,一些学者认为,移民汇款主要出自他们对留守家庭成员经济状况的关心,是移民的利他主义精神和家庭责任感的体现(Lucas & Stark,1985)。所

以老家的经济状况越差,留守家庭成员的数量越多,移民汇款的数额也越多。

虽然利他主义理论得到了很多实证研究的支持(Agarwal & Horowitz, 2002; Johnson & Whitelaw, 1974),但也有些学者争锋相对地指出,即使在家庭这种相对温馨的社会组织内部,完全的利他行为也是不存在的,而自身经济效用的最大化才是导致移民汇款的决定性因素,由此就形成了对汇款行为的第二种理论解释,即利己主义理论(Lucas & Stark, 1985; Cox, 1987; Hoddinott, 1994)。

Lucas和Stark(1985)列举了与汇款相关的三种主要的利己主义经济动机。一是为了维持财产的继承权。外出打工会削弱移民与老家的联系,这会威胁他们日后继承家庭财产资格。而汇款一方面可以显示移民对家族的忠诚,另一方面可以保持与老家的经济联系,这有助于移民获得继承权。二是为了维护移民在老家的土地和房产。移民在老家通常留有一定的土地和房产,这些土地需要有人代为耕种,房产等其他固定资产也需要有人代为看护,而汇款主要是为了支付由此产生的费用。三是为日后返乡未雨绸缪。很多移民有日后回乡投资或养老的意愿,汇款一方面可用于投资房屋等固定资产,另一方面也可用于维持与老家亲友的关系,所以向老家汇款有助于移民回乡以后尽快地融入老家的生活环境。

目前,学术界对移民汇款是利他还是利己的争论仍在进行当中,国内外对中国农民工汇款行为的研究也主要沿着这两条理论脉络展开(胡枫等, 2008; 李强等, 2008)。总体来看,这两个经典的汇款理论虽都有可取之处,但它们都对人性做出了比较极端的假设,所以也都有失偏颇。除此之外,这两个理论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们都将汇款行为视为迁移者的个人决策,这与后来兴起的新经济学迁移理论有本质的不同。

2.2 共同保险理论

与两种古典的汇款理论不同,新经济学迁移理论的代表人物Stark和Lucas(1988)为移民汇款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理论解释,即共同保险理论。该理论认为,迁移和汇款都是家庭为了分散投资风险、实现家庭整体利益最大化所采取的一种家庭策略行为。首先,对农村老家而言,农业生产必然存在一定的风险,如遭遇自然灾害、病虫害、投资新技术的不确定性等。其次,对迁移者个人而言,城市同样存在很多风险,如失业、工作的不稳定性、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应等。但农村和城市分属不同的部门,二者的风险通常不会同时发生,所以家庭作为一个理性行动者,应该让一部分家庭成员去城市打工,另一部分继续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从而分散投资风险,并在一方遇到困难时通过相互汇款达到共同保险的目的(Stark & Lucas, 1988; Agarwal & Horowitz, 2002)。所以,从这个理论视角来看,移民汇款既是对老家遭遇经济损失时的一种救济,也是为自己城市生活的不确定性所购买的一份保险,以期未来遇到困难时能够得到家人的经济资助。所以,当城市的失业风险较高、工作稳定性较差的时候,移民汇款的可能性较大,汇款的数额也较高。

Stark和Lucas(1988)对博茨瓦纳的研究发现,农村老家遭遇自然灾害会显著增加进城务工人员的汇款数额,他们认为,这与共同保险理论所强调的风险分担精神相一致,所以验证了该理论。不过Stark和Lucas的论证并未得到学术界的一致认可,因为具有利他主义精神的移民也会在老家遭遇困难时义无反顾地伸出援手。所以,仅凭这一事实并不足以区分移民的汇款行为是为了与家人共同承担经济风险,还是纯粹出于对家人的关心。为了避免这种理论上的模棱两可之处,Amuedo - Dorantes和Pozo(2006)指出,可以对共同保险理论进行更加直接的检验,即:研究移民在迁入地的工作稳定性对汇款行为的影响。因为从理论上讲,迁入地失业风险的上升不会改变移民的利他主义倾向,但却会显著增加他们向老家购买保险的经济动机。他们对迁往美国的墨西哥移民的研究发现,那些没有合法居留权的、没有社会福利的、缺乏社交网络的、工作经验较少以及外出时间较短的移民不仅收入的不稳定性较高,而且向老家汇款的数额也显著高于那些收入相对稳定的移民群体。所以他们认为,规避未来的经济风险和不确定性也是导致移民汇款的一个重要因素。

Amuedo - Dorantes和Pozo(2006)的研究充分说明,移民的汇款行为不仅取决于移民自身及其家人的经济福利,而且取决于他们所处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这对我们深入理解中国农民工的汇款行为具有极为重要的启发意义。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充分认识到,一个理论成立与否,不仅取决于理论本身,而且取决于它所应用的文化背景和社会情境。所以,在将共同保险理论应用到中国时,我们也必须考虑到中国

社会的特殊性。

从理论上讲,共同保险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将汇款视为迁移者与其家庭成员共同达成的一项协议,协议的双方彼此充当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角色,而协议的目的是保障双方的利益以及家庭整体的经济安全。但是,这种建立在经济理性基础上的契约安排在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下可能并不成立(李强 2001)。与强调个体利益的西方家庭不同,中国家庭常被描述为一个高度团结的利益共同体(Chu & Yu 2010; Lee, Parish & Willis, 1994),所以即使没有相互之间的汇款,家庭成员也能保持高度的目标一致性。在中国,父母对子女的投资并不一定要得到子女的偿还;同样,子女向老家汇款也不会以必须得到父母的资金补偿为主要目的。正如李强(2001)所言,中国家庭内部存在一种天然的利他主义,农民工将打工收入寄回家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家庭本来就是一个整体,而不是因为他们与父母之间存在某种契约或协议。所以在李强(2001)看来,中国农民工的汇款行为更近似于一种存款,即将打工的收入盈余存起来以提高整个家庭的经济福利。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农民工的汇款数额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自身的经济实力,所以工作稳定性差、福利水平低不仅不会刺激农民工增加汇款数额,反而会显著降低农民工向老家汇款的经济能力。所以,在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下,我们有可能观察到与共同保险理论完全相反的结果。

但是,无论共同保险理论在中国成立与否,它都为我们深入研究中国农民工的汇款行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与西方国家的移民相同,中国农民工同样难以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工作待遇和社会福利。而且,由于中国特殊的户籍管理制度,农民工面临的风险可能更多,程度也更加严重。2011年《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显示,流动人口大多在劳动强度较高的制造业或服务性行业工作,而较难进入相对收入较高、工作稳定性较强的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业;约有1/3的流动人口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工作缺乏法律保障;而且超过一半的流动人口没有参加任何社会保险。所以,流动人口的工作稳定性和社会福利水平都很低,这种不利的工作环境是限制了农民工向老家的汇款数额,还是像共同保险理论所预言的那样,是刺激中国农民工向老家汇款的重要原因?毫无疑问,对这个问题进行回答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3 数据和变量

本文使用的是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该数据由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司连同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共同搜集完成,调查对象为2013年5月份年龄在15-59岁之间的流入人口。调查采用了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PPS)的概率抽样方法,样本覆盖了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流动人口。与其他流动人口调查相比,该调查具有覆盖面广、样本量大、抽样严格、时效性强等优点,是我们研究流动人口问题不可多得的数据资料。

2013年的调查除了在全国范围内对流动人口进行抽样监测以外,还在上海、苏州、无锡、武汉、长沙、西安、泉州和咸阳8个城市展开了以“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为主题的专项调查。本研究使用的是该专项调查数据,因为只有专项调查问卷中询问了流动人口向老家的汇款数额。由于本研究关注的是农民工对老家的汇款行为,所以分析时将样本限定在户口为农村的流动人口,符合这一条件的样本量为14920人;在去除缺失值以后,进入实际分析过程的样本量为13756人。

本文的因变量是农民工在过去一年向老家的汇款数额,这是一个连续变量,可以使用标准的OLS回归进行分析。不过,考虑到样本中有一定比例的农民工没有汇款,而且在汇款的农民工中,汇款数额也存在比较明显的偏态分布,所以在分析时,我们首先对那些汇款数额大于0的值取对数,然后使用Cragg(1971)提出的跨栏模型(hurdle model)对这个新生成的因变量进行分析。跨栏模型也被称作两部分模型(two-part model),它的好处在于它将农民工的汇款决策分为是否汇款和汇款多少两个步骤,对第一步决策使用Probit模型,对第二步决策使用断尾回归(truncated regression),这就使得整个模型的设定更加灵活。除了跨栏模型,本文还使用Tobit模型等其他建模方法对分析结果的稳健性进行了检验。

在自变量方面,本文的核心自变量是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稳定性,我们从迁入地的就业率、是否享受社

会保险、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和外出流动时间四个角度来对之进行测量。首先,很多研究表明,在城市寻求工作和发展的机会是农民进城的主要目的,所以失业是他们面临的最主要的经济风险。在分析时,我们使用根据样本计算的迁入地流动人口的就业率作为农民工失业风险的测量指标。其次,即使在有工作的情况下,是否享受社会保险以及是否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也会影响农民工的经济安全,所以,这两个变量也是测量工作稳定性的重要维度。最后,外出流动时间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农民工的工作稳定性以及对城市生活的适应性。因为一般来说,流动时间越长,工作和收入越稳定,对流入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也越适应,所以本文将综合使用这四个变量来检验共同保险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

除了共同保险理论,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也是影响移民汇款行为的重要因素,所以在分析时,我们也针对这两种理论模型设计了不同的自变量。

与利他主义理论相关的自变量有:配偶是否留在老家、留守子女的数量、老家是否有养老负担、是否举家迁移、迁入地的家庭规模。利他主义理论认为,对家庭成员的关心是导致移民汇款的主要原因,所以有留守的老人、子女和配偶会增加汇款的可能性和数额,而举家迁移、迁出的家庭成员较多会降低汇款的可能性和数额。

与利己主义理论相关的自变量有:老家的住房面积、老家是否有土地、老家是否缺乏劳动力、是否有回乡建房或养老的打算。利己主义理论认为,老家有财产可以继承或需要别人代为看护、有土地需要代为耕种以及有回乡养老或投资的打算会促进移民更多地汇款。所以,老家的住房面积较大、老家有土地且缺乏劳动力、有回乡养老或建房打算的农民工汇款的可能性较大,且汇款数额较高。

最后,本文在模型分析时还控制了农民工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年限以及过去一年的收入盈余。

4 分析结果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1描述了农民工的汇款数额及其占收入盈余的百分比。可以发现:首先,样本中农民工的汇款比例很高,为78.8%;其次,农民工的年汇款数额也很高,平均为8544元,汇款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农民工超过了30%;最后,农民工的汇款数额占收入盈余的百分比也非常高,平均为28.3%,大约1/4的农民工将超过40%的收入盈余带回了家,12.1%的农民工带回的钱甚至超过了收入盈余的70%。由此可见,在中国,农民工向老家汇款的现象非常普遍,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是完全一致的。

表1 汇款数额及其占收入盈余的百分比

汇款数额	百分比 (%)	样本量 (人)	汇款数额占收入盈余的百分比	百分比 (%)	样本量 (人)
0元	21.2	2920	0%	21.2	2920
2000元以下	10.1	1388	10%以下	23.6	3251
2000-4999元	20.3	2792	10%-19.9%	15.1	2078
5000-9999元	17.9	2455	20%-39.9%	14.4	1979
10000-19999元	14.3	1962	40%-69.9%	13.6	1864
20000元及以上	16.3	2239	70%及以上	12.1	1664
合计	100.0	13756	合计	100.0	13756

什么样的农民工更可能向老家汇款?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分是否汇款对样本中农民工的基本特征进行了统计描述,结果如表2所示。可以发现,汇款的农民工有配偶留在老家的比例较高,留守子女的数量较多,且老家有赡养负担的比例也较高,这说明对老家亲人生活状况的关心是影响农民工汇款的一个重要因素。

除此之外,汇款的农民工举家迁移的比例较低,且在迁入地的家庭规模较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利他主义理论。

此外,从与利己主义理论相关的几个变量看,汇款的农民工有回乡养老或建房打算的比例较高,老家的住房面积较大,在老家有土地的比例较高,且老家缺乏劳动力的比例也较高,这说明为日后回乡养老或发展做准备、维护在老家的房屋和田产、弥补外出以后老家劳动力的不足也是影响农民工汇款的重要因素。

表2 样本特征的描述性分析

变量类别/指标	未汇款	汇款	合计
性别(%)			
男	52.9	52.3	52.4
女	47.1	47.7	47.6
年龄(岁)			
均值	30.9	32.8	32.4
标准差	9.6	8.7	9.0
是否结婚(%)			
是	72.4	82.5	80.3
否	27.6	17.5	19.7
教育年限(年)			
均值	9.7	9.7	9.7
标准差	2.5	2.5	2.5
配偶是否留在老家(%)			
是	3.1	6.2	5.5
否	97.0	93.8	94.5
留守子女数量(人)			
均值	0.2	0.5	0.4
标准差	0.5	0.7	0.7
老家是否有赡养负担(%)			
是	56.9	76.8	72.6
否	43.2	23.2	27.4
是否举家迁移(%)			
是	36.5	25.4	27.8
否	63.5	74.6	72.3
迁入地家庭规模(人)			
均值	2.6	2.4	2.5
标准差	1.2	1.1	1.1
是否有回乡养老或建房打算(%)			
是	61.1	67.0	65.8
否	38.9	33.0	34.2
老家房产面积(平方米)			
均值	159.4	170.4	168.1
标准差	94.2	92.2	92.8
老家是否有土地(%)			
是	84.1	91.3	89.8
否	15.9	8.7	10.2
老家是否缺乏劳动力(%)			
是	20.3	29.8	27.8
否	79.7	70.3	72.2
迁入地就业率(%)			
均值	89.8	90.6	90.4
标准差	5.3	5.1	5.2
是否享受社会保险(%)			
是	27.2	35.3	33.6
否	72.8	64.7	66.4
是否签订劳动合同(%)			
签订	33.5	40.9	39.3
未签订	20.6	17.8	18.4
自雇	30.2	30.6	30.5
家庭帮工	3.2	2.6	2.7
无工作	12.6	8.1	9.1
外出流动时间(年)			
均值	7.8	8.8	8.6
标准差	6.3	6.2	6.2
收入盈余(千元)			
均值	35.1	39.4	38.5
标准差	51.7	47.9	48.7
样本量	2920	10836	13756

但是,从本文最关心的四个与工作稳定性相关的变量来看,共同保险理论并未得到数据的支持。从表2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有汇款行为的农民工所在迁入地的就业率反而比没有汇款的农民工高,而且他们享受社会保险的比例和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也比较高,外出流动时间也相对较长。所以总体来看,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越稳定,向老家汇款的可能性反而越大,这与共同保险理论的预期恰好相反。由此可见,根据国外移民的研究经验得出的共同保险理论在中国可能并不适用。

4.2 模型分析结果

虽然表2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没有验证共同保险理论,但这种双变量的统计描述由于没有控制其他变量,所以也存在虚假相关的可能性。为了对工作稳定性和农民工汇款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加深入和严谨的分析,本文还使用Cragg(1971)提出的跨栏模型对农民工的汇款决策和数额分别进行了分析。跨栏模型将汇款决策分为是否汇款和汇款多少两个步骤,其中第一步使用Probit模型,第二步使用断尾回归^①。Probit模型的输出结果见表3,断尾回归的输出结果见表4。

表3和表4都采取了嵌套模型的分析方法^②。其中模型1和模型5纳入了与共同保险理论相关的四个自变量和所有控制变量,模型2和模型6在模型1和模型5的基础上又纳入了与利他主义理论相关的自变量,而模型

^①即首先对是否汇款这个二分变量进行Probit回归,这与一般的Probit模型没有区别;然后对汇款数额大于0的部分进行断尾回归(truncated regression),这与通常使用的断尾回归法完全相同。受篇幅限制,文章不能详细介绍模型设定的具体细节。读者可参考Cragg在1971年发表的文章以了解更多细节。

^②嵌套模型(nested model)是量化研究中常用的一种分析策略,这种分析方法的特点是逐渐增加控制变量以比较模型主要自变量的回归系数的变化。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常常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所以表面上看来有关联的变量在纳入其他变量之后这种关联性有可能会消失,而如果纳入多个控制变量之后变量之间的关系依然存在,我们则会有更大的把握认为这种关系是真实存在的。

表3 汇款决策的 Probit 回归输出结果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共同保险理论				
迁入地就业率	1.618 *** (0.239)	1.282 *** (0.244)	1.086 *** (0.246)	1.099 *** (0.247)
参加社会保险	0.149 *** (0.031)	0.169 *** (0.031)	0.170 *** (0.031)	0.171 *** (0.031)
合同类型(未签订合同=0)				
签订合同	0.123 *** (0.037)	0.119 ** (0.038)	0.116 ** (0.038)	0.116 ** (0.038)
自雇	-0.011 (0.037)	0.090 * (0.038)	0.096 * (0.038)	0.096 * (0.038)
家庭帮工	-0.079 (0.078)	0.078 (0.080)	0.075 (0.080)	0.067 (0.080)
无业	-0.148 ** (0.049)	-0.025 (0.051)	-0.016 (0.051)	-0.023 (0.051)
外出流动时间	0.002 (0.002)	0.007 ** (0.003)	0.008 ** (0.003)	0.007 ** (0.003)
利他主义理论				
有留守配偶		-0.029 (0.069)	-0.038 (0.069)	-0.301 ** (0.101)
留守子女数量		0.162 *** (0.025)	0.156 *** (0.025)	0.154 *** (0.025)
老家有赡养负担		0.459 *** (0.027)	0.418 *** (0.028)	0.418 *** (0.028)
举家迁移		-0.177 *** (0.031)	-0.153 *** (0.032)	-0.153 *** (0.032)
迁入地家庭规模		-0.084 *** (0.017)	-0.081 *** (0.017)	-0.081 *** (0.017)
利己主义理论				
有回乡养老或建房意愿			0.017 (0.027)	0.016 (0.027)
老家住房面积			0.005 *** (0.001)	0.005 *** (0.001)
老家有土地			0.273 *** (0.039)	0.272 *** (0.039)
老家缺乏劳动力			0.157 *** (0.030)	0.155 *** (0.030)
控制变量				
男性	-0.050 (0.026)	-0.037 (0.026)	-0.045 (0.027)	-0.063 * (0.027)
年龄	0.103 *** (0.011)	0.071 *** (0.011)	0.071 *** (0.012)	0.072 *** (0.012)
年龄平方	-0.001 *** (0.000)	-0.001 *** (0.000)	-0.001 *** (0.000)	-0.001 *** (0.000)
已结婚	0.128 ** (0.043)	0.198 *** (0.050)	0.201 *** (0.051)	0.198 *** (0.051)
教育年限	0.008 (0.005)	0.005 (0.006)	0.008 (0.006)	0.007 (0.006)
收入盈余	0.001 * (0.000)	0.001 *** (0.000)	0.001 ** (0.000)	0.001 ** (0.000)
交互项				
男性*有留守配偶				0.437 *** (0.128)
截距	-2.715 *** (0.290)	-2.071 *** (0.297)	-2.294 *** (0.299)	-2.304 *** (0.300)
伪 R-square	0.031	0.072	0.079	0.080
似然比卡方	442.97 ***	1022.28 ***	1125.84 ***	1137.49 ***
自由度	13	18	22	23
样本量	13756	13756	13756	13756

注:老家住房面积的测量单位是10平方米,收入盈余的测量单位为1000元,如果使用原始测量单位,这两个变量的回归系数都很小,所以分析时对其进行调整。表中汇报的是回归系数,括号中为标准误。* p<0.05; ** p<0.01; *** p<0.001。

3和模型7又在模型2和模型6的基础上进一步纳入了与利己主义理论相关的自变量。虽然在每一步增加自变量之后,与共同保险理论相关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都会发生细微的变化,但它们的符号和统计检验结果却是非常稳定的,所以我们的研究结论并不会因为变量的增加而发生本质的变化。

综合上述模型可以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以后,迁入地的就业率较高、享有社会保险以及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汇款的可能性较大,且汇款数额较多。而且农民工外出流动的时间越长,汇款的可能性越大,且汇款数额越多。所以,与共同保险理论的预期恰好相反,在中国,稳定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不仅没有减少农民工的汇款数额,反而会刺激他们向老家提供更多的汇款。而且,中国农民工的汇款并未随外出时间的增加呈现任何衰退的迹象,与之相对,农民工汇款的可能性和数额都随外出时间的增加而显著增加。所以,共同保险理论并未得到数据的检验。

如前所述,共同保险理论在中国的不适用性可能与中国特殊的家庭传统有关。与强调个体

表4 汇款数额的断尾回归输出结果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共同保险理论				
迁入地就业率	4.173 *** (0.212)	3.577 *** (0.207)	3.352 *** (0.207)	3.358 *** (0.207)
参加社会保险	0.126 *** (0.026)	0.135 *** (0.025)	0.138 *** (0.025)	0.138 *** (0.025)
合同类型(未签订合同=0)				
签订合同	0.220 *** (0.032)	0.195 *** (0.031)	0.188 *** (0.031)	0.189 *** (0.031)
自雇	-0.217 *** (0.032)	-0.093 ** (0.032)	-0.078 * (0.032)	-0.078 * (0.032)
家庭帮工	-0.240 *** (0.071)	-0.075 (0.069)	-0.055 (0.069)	-0.062 (0.069)
无业	-0.225 *** (0.046)	-0.090 * (0.045)	-0.077 (0.045)	-0.083 (0.045)
外出流动时间	0.003 (0.002)	0.007 ** (0.002)	0.007 *** (0.002)	0.007 *** (0.002)
利他主义理论				
有留守配偶		0.147 ** (0.048)	0.138 ** (0.048)	-0.068 (0.079)
留守子女数量		0.256 *** (0.018)	0.243 *** (0.018)	0.242 *** (0.018)
老家有赡养负担		-0.064 * (0.025)	-0.071 ** (0.025)	-0.071 ** (0.025)
举家迁移		-0.199 *** (0.027)	-0.171 *** (0.027)	-0.171 *** (0.027)
迁入地家庭规模		-0.075 *** (0.015)	-0.076 *** (0.015)	-0.075 *** (0.015)
利己主义理论				
有回乡养老或建房意愿			0.166 *** (0.023)	0.165 *** (0.023)
老家住房面积			0.006 *** (0.001)	0.006 *** (0.001)
老家有土地			0.111 ** (0.037)	0.109 ** (0.037)
老家缺乏劳动力			0.029 (0.023)	0.027 (0.023)
控制变量				
男性	0.086 *** (0.022)	0.072 *** (0.022)	0.063 ** (0.022)	0.046 * (0.022)
年龄	0.002 (0.010)	-0.006 (0.010)	-0.005 (0.010)	-0.004 (0.010)
年龄平方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已结婚	0.193 *** (0.038)	0.179 *** (0.044)	0.165 *** (0.044)	0.161 *** (0.044)
教育年限	-0.014 ** (0.005)	-0.008 (0.005)	-0.003 (0.005)	-0.004 (0.005)
收入盈余	0.003 *** (0.000)	0.003 *** (0.000)	0.003 *** (0.000)	0.003 *** (0.000)
交互项				
男性* 有留守配偶				0.303 *** (0.091)
截距				
	4.622 *** (0.261)	5.390 *** (0.256)	5.204 *** (0.256)	5.200 *** (0.255)
sigma				
	1.096 *** (0.007)	1.063 *** (0.007)	1.058 *** (0.007)	1.057 *** (0.007)
Wald 卡方				
	1290.39 ***	2057.28 ***	2182.51 ***	2195.69 ***
自由度				
	13	18	22	23
样本量				
	10836	10836	10836	10836

注:老家住房面积的测量单位是10平方米,收入盈余的测量单位为1000元,如果使用原始测量单位,这两个变量的回归系数都很小,所以分析时对其进行调整。表中汇报的是回归系数,括号中为标准误。*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利益的西方家庭不同,中国家庭向来重视家庭内部的团结和利益的一致性。家庭只要没有分家就是一个经济共同体,作为一家人,相互之间的经济资助是无条件的。所以,中国父母与子女之间并不存在那种基于等价交换基础上的契约或协议;同样,农民工也不会将汇款视为向老家购买保险,因为即使他们不买这份保险,老家也会在他们遭遇经济困难时义无反顾地伸出援手。所以,在中国,农民工在城市相对低下的工作环境并不是导致他们大规模汇款的主要原因;与之相反,工作稳定性差、社会福利水平低反而会大大降低他们向老家汇款的经济实力。而考虑到外出务工收入对农村家庭的重要性,迅速提高农民工的工作稳定性和社会保障水平无疑对提高农村家庭的经济福利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除了对共同保险理论进行检验之外,本文也对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这两种理论模型进行了检验。首先,从与利他主义理论相关的自变量看,老家有留守的子女和需要赡养的老人会显著增加农民工汇款的可能性和数额;但是,有留守的配偶对是否汇款和汇款

数额都没有显著影响。除此之外,举家迁移会显著降低农民工汇款的可能性和数额,而且农民工在迁入地的家庭规模越大,向老家汇款的可能性越小,且汇款数额越少。总体来看,这些结果有力地验证了利他主义假设,说明有留守的亲人是导致农民工汇款的重要因素,而随着家人逐渐到迁入地与农民工会合,他们向老家汇款的可能性和数额都会显著降低。

其次,利己主义理论也得到了验证。分析结果显示:第一,有回乡养老或建房的意愿对是否汇款没有显著影响,但会显著增加汇款数额;第二,老家的住房面积越大,汇款的可能性也越大,且汇款数额越多;第三,老家有土地需要耕种且缺乏劳动力的农民工汇款的可能性较大,且汇款数额较多。所以,有回乡养老或建房的打算、老家有房产可以继承或需要别人代为看护、有土地需要代为耕种也是激励农民工汇款的重要因素。

虽然在上述模型中,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这两种理论模型都得到了数据的检验,但留守配偶对汇款行为几乎没有显著影响这一现象仍然值得进一步分析。李强(2001)认为,中国家庭更加重视纵向的父子关系,而轻视横向的夫妻关系,所以父母和子女对汇款的影响较大,而配偶的影响较小。不过笔者认为,这只是导致上述结果的一个原因,而不是全部。因为一般来说,留守的老人和子女不具备参加劳动的能力,是需要抚养的对象;而配偶通常处于劳动年龄,不仅不需要抚养,甚至还能帮助照顾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子女,所以有留守的配偶不会显著增加汇款的可能性和汇款数额。

如果上述假设成立,那么配偶对汇款行为的影响应该随性别的变化而变化,因为通常来说,男性对农村家庭的经济贡献大于女性,所以丈夫留守对老家的经济意义更大。为了对该假设进行检验,我们在模型3和模型7的基础上增加了男性和是否有留守配偶的交互项。从模型4和模型8的输出结果可以发现,该交互项显著为正,这说明,妻子留守时丈夫向老家汇款的可能性和数额显著高于丈夫留守而妻子外出时的情况,我们的猜测得到了检验。

最后,从表3和表4的分析结果还可以发现,一些控制变量也对农民工的汇款行为具有显著影响。首先,农民工的汇款数额随年龄呈“倒U型”曲线变化,且曲线大约在37岁左右达到最高点。笔者认为,这可能反映了不同年龄的农民工所肩负的家庭责任,37岁左右的农民工更可能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人生阶段,家庭负担较重,所以他们向老家汇款的可能性较大。其次,结过婚的农民工向老家汇款的可能性和数额都显著较高,这主要是因为个体在结婚以后会肩负更多的家庭责任。最后,汇款的可能性和数额都随农民工收入的增加而增加,这主要是因为收入越高,农民工汇款的经济能力越强。

除了跨栏模型,本文也尝试使用其他建模方法对分析结果的稳健性进行了检验。对于连续型的因变量,普通最小二乘(OLS)是目前最常用的分析方法。不过由于汇款数额存在一定比例的0值堆积,所以使用Tobit模型对取值为0的个案进行归并(censor)可能更加合适。Tobit模型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0值堆积对估计结果的影响,但是它的估计结果对正态分布假定比较敏感,相对而言,基于归并最小离差法(Censored Least Absolute Deviation,简记为CLAD)得到的估计结果更加稳健^①。为了对OLS、Tobit和CLAD之间的差异进行比较,表5同时汇报了这三种模型的输出结果。

从表5可以发现,虽然OLS、Tobit和CLAD这三种方法的估计结果有所不同,但它们的结论是完全一致的。而且与之前使用的跨栏模型相同,这三种模型都验证了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理论,但都没有验证共同保险理论。所以,本文的研究结论是非常稳健的。

^①Tobit模型使用最大似然法估计回归系数,这种估计方法建立在回归误差项服从正态分布的假定之上,但这是一个很强的假定,如若不能满足,有可能导致回归系数有偏。OLS法在大样本情况下可以不依赖正态分布假定,但这种方法的核心是使离差平方和最小,由于对离差(观测值与均值之间的偏差)取平方,这导致它受样本极值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在极值很多的情况下。在本例中,取值为0(即没有汇款)的人是极小值,而且这部分人在样本中所占的比例超过20%,所以这部分人会严重影响OLS的估计结果,所以OLS法不太合适。另一种估计方法即CLAD法,这种方法同样不需假定正态分布,但与OLS不同的是,它是对离差的绝对值之和进行最小化,由于没有取平方,它受极值的影响较小;但这种方法的缺点是回归系数的统计性质不如OLS简单,且运算量很大。但综合来说,CLAD是一种最为稳健的方法。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

	OLS	Tobit	CLAD
共同保险理论			
迁入地就业率	5.144 *** (0.597)	5.968 *** (0.758)	4.356 *** (0.322)
参加社会保险	0.494 *** (0.073)	0.599 *** (0.092)	0.334 *** (0.040)
合同类型(未签订合同=0)			
签订合同	0.430 *** (0.090)	0.517 *** (0.114)	0.140 ** (0.049)
自雇	0.175 (0.091)	0.249* (0.116)	-0.019 (0.050)
家庭帮工	0.114 (0.196)	0.155 (0.249)	-0.139 (0.104)
无业	-0.118 (0.127)	-0.153 (0.162)	-0.068 (0.068)
外出流动时间	0.023 *** (0.006)	0.028 *** (0.007)	0.007* (0.003)
利他主义理论			
有留守配偶	-0.031 (0.146)	-0.105 (0.183)	0.140 (0.079)
留守子女数量	0.470 *** (0.054)	0.518 *** (0.068)	0.296 *** (0.029)
老家有赡养负担	1.012 *** (0.069)	1.342 *** (0.089)	0.311 *** (0.038)
举家迁移	-0.525 *** (0.078)	-0.651 *** (0.099)	-0.309 *** (0.042)
迁入地家庭规模	-0.279 *** (0.041)	-0.359 *** (0.053)	-0.216 *** (0.022)
利己主义理论			
有回乡养老或建房意愿	0.178 ** (0.065)	0.199* (0.083)	0.173 *** (0.035)
老家住房面积	0.016 *** (0.003)	0.019 *** (0.004)	0.009 *** (0.002)
老家有土地	0.810 *** (0.100)	1.056 *** (0.129)	0.404 *** (0.054)
老家缺乏劳动力	0.359 *** (0.068)	0.449 *** (0.086)	0.140 *** (0.037)
控制变量			
男性	-0.066 (0.063)	-0.105 (0.079)	0.017 (0.034)
年龄	0.180 *** (0.028)	0.236 *** (0.036)	0.043 ** (0.015)
年龄平方	-0.002 *** (0.000)	-0.003 *** (0.000)	-0.001 ** (0.000)
已结婚	0.694 *** (0.123)	0.889 *** (0.157)	0.464 *** (0.066)
教育年限	0.017 (0.013)	0.022 (0.017)	0.007 (0.007)
收入盈余	0.004 *** (0.001)	0.005 *** (0.001)	0.004 *** (0.000)
截距	-3.609 *** (0.727)	-6.444 *** (0.926)	2.445 *** (0.393)
R-square/伪 R-square	0.115	0.023	0.055
样本量	13756	13756	13756

注:老家住房面积的测量单位是10平方米,收入盈余的测量单位为1000元,如果使用原始测量单位,这两个变量的回归系数都很小,所以分析时对其进行了调整。表中汇报的是回归系数,括号中为标准误。*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5 结论和讨论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之间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流动不仅为城市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而且为农村家庭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农民工向老家的汇款已成为联系城乡经济的重要纽带之一。本文使用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结合多种理论模型对农民工的汇款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研究。研究发现,农民工的汇款比例很高,为78.8%;年平均汇款数额也很高,约为8500元。多变量的模型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农民工的汇款行为不仅是为了提高他们自身及其家人的经济福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他们在城市的工作环境的影响。不过,与西方学者提出的共同保险理论不同,在中国,不稳定的工作环境会显著降低农民工汇款的数额和可能性,这不仅丰富并发展了已有的汇款理论,而且对中国城乡经济的共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从理论上讲,本文的分析结果充分说明,任何一个理论的应用都不能离开它所赖以生存的文化背景和社会情境。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有着完全不同的家庭传统,中国家庭天然就是一个整体,这不仅是导致农民工汇款的重要原因,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共同保险理论在中国的不适用性。除此之外,研究还发现,有留守的子女和老人也会显著增加农民工的汇款数额,这一方面体现了西方学者所说的家庭成员之间天然的利他主义精神,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农民工所肩负的双向的家庭责任。所以笔者认为,中国特殊的家庭传统不仅为家庭本身带来了内部的团结和凝

聚力,而且赋予了农民工更多的家庭使命,这是导致农民工向老家汇款的比例和数额都显著高于其他国家的主要原因。

其次,从政策的角度看,本文的分析结果也再次论证了增加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不过,与以往的研究主要从社会融合的角度出发进行论证不同,本研究发现,为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提供更多的保障不仅有利于他们融入城市生活,而且有助于他们向老家提供更多的汇款;所以,它对维持城市和农村的稳定和发展都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我们的样本中,处于失业状态的农民工比例虽然不足10%,但是在受雇的农民工当中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接近1/3,而且有2/3的农民工在迁入地没有享受任何社会保险。所以总体而言,农民工的工作稳定性和社会保障水平仍然较低,这不仅不利于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而且会显著降低他们向老家的汇款数额,从而对迁出地家庭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不利影响。所以,迅速提高农民工的工作稳定性和社会保障水平对人口迁入地和迁出地的稳定和发展都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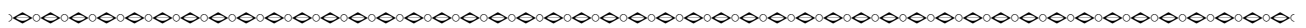
参考文献:

- 段成荣,杨舸,张斐,卢雪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的九大趋势[J]. 人口研究, 2008 (6): 30-43.
- 都阳,朴之水. 劳动力迁移收入转移与贫困变化[J]. 中国农村观察, 2003 (5): 2-17.
-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M]. 北京: 中国人口出版社, 2011.
- 国家统计局. 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OL]. 2014-02-24.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402/t20140224_514970.html
- 李强. 中国外出农民工及其汇款之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01 (4): 64-76.
- 李强,毛学峰,张涛. 农民工汇款的决策、数量与用途分析[J]. 中国农村观察, 2008 (3): 2-12.
- 梁在,诸冈秀树. 国际移民与发展: 以中国为例[J]. 中国劳动经济学, 2006 (3): 25-45.
- 胡枫,史宇鹏,王其文. 中国的农民工汇款是利他的吗? 基于区间回归模型的分析[J]. 金融研究, 2008 (1): 175-190.
- Agarwal R. and Horowitz A. W. . Are International Remittances Altruism or Insurance? Evidence from Guyana Using Multiple - Migrant Households [J]. *World Development* ,2002 30(11) : 2033 - 2044.
- Amuedo - Dorantes C. and Pozo S. . Remittances as Insurance: Evidence from Mexican Immigrants [J].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006 19(2) : 227 - 254.
- Becker G. S. . A Theory of Social Interactions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4 82(6) : 1063 - 93.
- Becker G. S. and Tomes N. . An Equilibrium Theory of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9 87(6) : 1153 - 1189.
- Bernheim B. D. , Shleifer A. , and Summers L. H. . The Strategic Bequest Motive [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5 93(6) : 1045 - 1076.
- Cai Q. . Migrant Remittances and Family Ties: A Case Study in China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pulation Geography* ,2003 9(6) : 471 - 483.
- Chu C. Y. Cyrus and Yu Ruorong. *Understanding Chinese Famili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aiwan and Southeast China* ,201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x D. . Motives for Private Income Transfers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7 95(3) : 508 - 46.
- Cragg J. G. . Some Statistical Models for Limited Dependent Variables with Application to the Demand for Durable Goods [J]. *Econometrica* ,1971 39: 829 - 844.
- Hoddinott J. . A model of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s Applied to Western Kenya [J]. *Oxford Economic Papers* ,1994 46(3) : 459 - 476.
- Johnson G. E. and Whitelaw W. E. . Urban - rural Income Transfers in Kenya: An Estimated - remittances Function [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74 22: 473 - 479.
- Lee Y. J. , William L. Parish and Robert J. Willis. Sons , Daughters , and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in Taiwan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4 99(4) : 1010 - 1041.

(下转第37页)

- Faggian A., P. McCann & S. Sheppard. Human Capital, Higher Education and Graduate Migration: An Analysis of Scottish and Welsh Students [J]. *Urban Studies* 2007, 44: 2511 – 2528.
- Faggian A., P. McCann & S. Sheppard. Some Evidence that Women are More Mobile than Men: Gender Differences in UK Graduate Migration Behaviour [J].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2007, 47: 517 – 539.
- Kodrzycki Y. K. Migration of recent college graduates: evidence from the 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of youth [J]. *New England Economic Review* 2001: 13 – 34.
- Schwartz A. Migration, Age and Education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6, 24: 701 – 720.
- Sjaastad L. The Costs and Returns of Human Migration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2, 70: 80 – 93.
- 陈秀山, 徐瑛. 中国区域差距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4, (5): 117 – 129 + 207.
- 葛玉好, 牟小凡, 刘峰. 大学生就业地域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扩展的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 [J].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报* 2011, No. 404: 81 – 89.
- 李亚玲, 汪戎. 人力资本分布结构与区域经济差距——一项基于中国各地区人力资本基尼系数的实证研究 [J]. *管理世界*, 2006, (12): 42 – 49.
- 许召元, 李善同. 区域间劳动力迁移对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的影响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8, (2): 38 – 52.
- 岳昌君. 大学生跨省流动的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J]. *复旦教育论坛* 2011, 9; No. 5002: 57 – 62.
- 岳书敬, 刘朝明. 人力资本与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J]. *经济研究* 2006, (4): 90 – 96 + 127.
- 张锦华. 教育溢出、教育贫困与教育补偿——外部性视角下弱势家庭和弱势地区的教育补偿机制研究 [J]. *教育研究* 2008, (7): 21 – 25.
- 张萍. 当前大学生就业地域取向及其思考 [J]. *中国大学生就业* 2007, (14): 31 – 32.
- 赵伟, 李芬. 异质性劳动力流动与区域收入差距: 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扩展分析 [J]. *中国人口科学* 2007, (1): 27 – 35 + 95.

[责任编辑: 武继磊]



(上接第 48 页)

- Lucas R. E., and Stark O. . Motivations to Remit: Evidence from Botswana [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5, 93(5): 901 – 918.
- Rozelle S., Taylor J. E. and DeBrauw A. . 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in China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9, 89(2): 287 – 91.
- Stark O., and Lucas R. E. . 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the Family [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88, 36(3): 465 – 481.
- Stark O. . *The Migration of Labor*, 1991, Cambridge, MA: Blackwell.

[责任编辑: 刘岚]